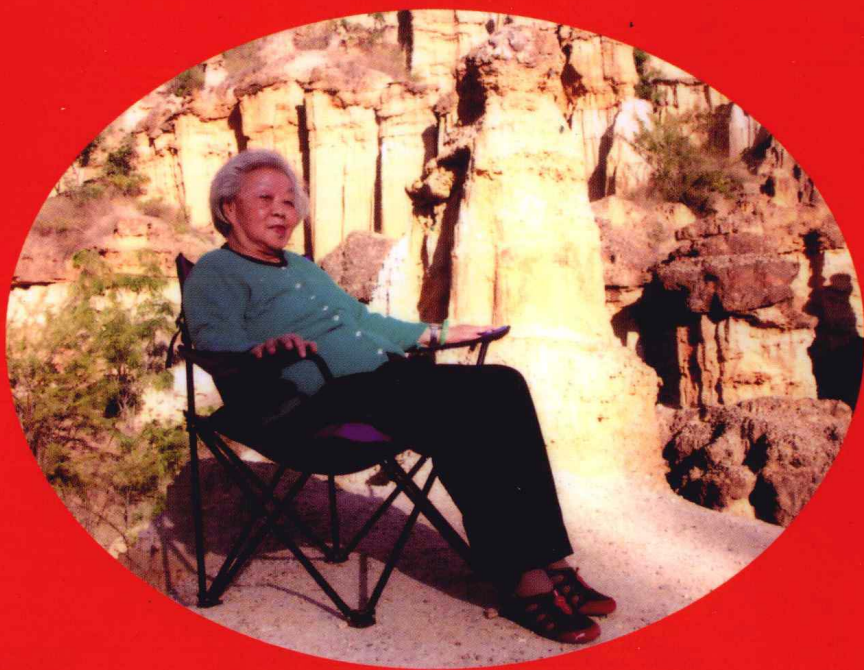


黄甘英自传

无怨无悔的人生



无怨无悔的人生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彭珮云

序 言

我是1998年从化工部调到全国妇联任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时和黄甘英同志相识的，那时她已经78岁，刚刚离休，她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开朗，精力充沛，敢



做敢为。在以后8年的时间里，多次与黄甘英同志接触，了解了她的过去，并被她传奇般的经历所吸引。2006年末，甘英同志把她的回忆录——《无怨无悔的人生》转给我，希望我能为她作序。这时她已是86岁高龄了，耄耋之年，仍然上下求索，笔耕不辍，着实让人敬佩，于是欣然提笔。

甘英同志出身在广东一个官宦家庭。她天资聪慧，热情开朗。还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的时候，就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的暴行无比地憎恨，并在1936年参加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她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之中。从北平做地下工作到冀南根据地，再到抗日前线，她和许多男同志一样，行军打仗，饱偿了战争年代的各种艰辛和考验，承受着失去第一个孩子的巨痛，从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新中国成立后，她服从组织分配来到全国妇联，从

此，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在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中，黄甘英同志受“四人帮”残酷迫害，身陷囹圄达8年之久，她出狱时，几乎丧失了说话、走路这些人最基本的能力，第二个女儿也遭受迫害而死。在经历了先后失去两个孩子的痛苦和这场牢狱之灾后，黄甘英同志依旧坚强、依旧乐观，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政治信仰，始终保持着对工作的激情和对生活的热爱。直至晚年离休后，黄甘英同志仍然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了凝聚海内外客家乡贤，共同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促进和维护祖国的统一，她发起成立了北京客家海外联谊会，举办客家文化研讨会，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帮助家乡架桥铺路，为家乡的父老乡亲走上致富的道路付出了努力。

读黄甘英同志这本自传，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一个人，只有当她把自己的命运和党的事业、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勇敢地面对各种艰难困苦，才能战胜生与死的考验，让自己的人生永远充实、精彩、美丽，无怨无悔。黄甘英同志自传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相信所有读过黄甘英同志这部自传的人，都会对这位了不起的女性肃然起敬，都会从中受到启迪，从而对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有新的感悟。

祝黄甘英同志健康长寿，晚年幸福。

顾秀莲

12月25日

自序

我今年八十七岁了，一辈子风风火火、忙忙碌碌，干工作从不知疲倦，也从不会偷懒，这已成为我的习惯。近来，我常常回首往事，童年、青少年、成年、老年的经历一幕一幕走马灯似地呈现在眼前。

我赶上了波澜壮阔的时代。我亲身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无论是在日寇侵华的铁蹄下，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腥风血雨中；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走资派”的残酷斗争中，甚至是被关押在黑暗的秦城监狱八年的冤狱中；以及在国际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大舞台的风云变幻中，我一直像个斗士一样，永不向艰难困苦低头，不向莫须有的罪名屈服，活得光明磊落。

回顾我的一生，在党的指引下，在平凡的岗位上，我为党的事业，为妇女解放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我无愧于国家，无愧于党。

曾经担任领导职务

- 全国妇联第四、五届副主席
-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委员
- 中国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 第十二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 第一届中纪委委员
- 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 第五、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
- 宋庆龄基金会常务理事
- 扶贫基金会理事
- 中国侨联顾问
- 广东梅州嘉应大学名誉董事长、教育基金会会长
- 北京海外客家联谊会会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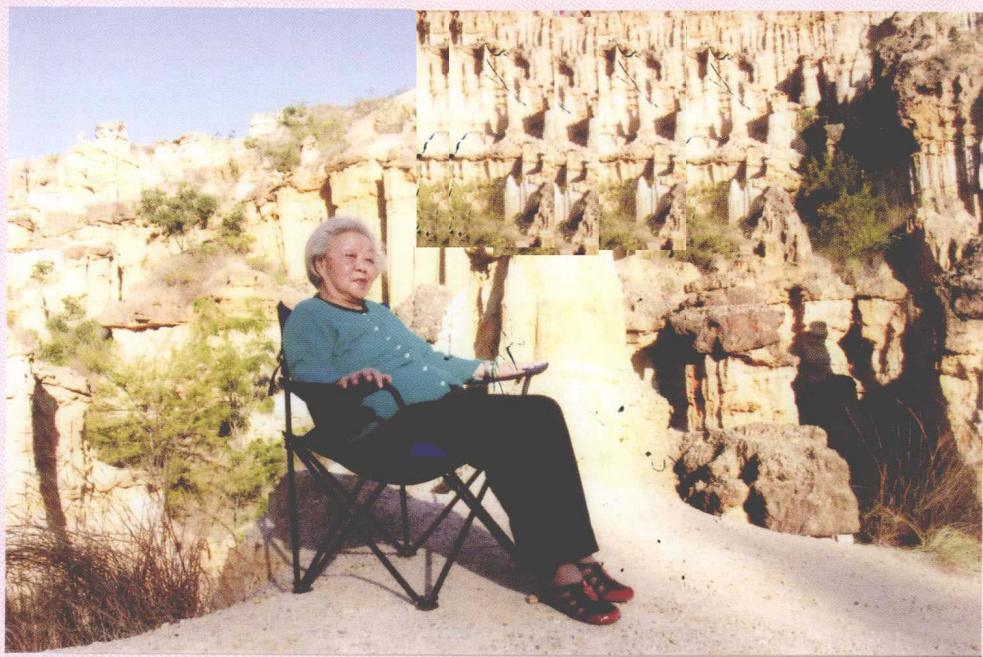
2004 5 7

无怨无悔的人生

黄甘英口述 邹紫金整理

简 历

黄甘英，广东梅县人，1920 年生于北京。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 年参加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 年入党，1938 年到冀南抗日根据地，曾任河北威县、重阳县委宣传、民运部长。1943 年调回北京做上层统战和知识分子工作。1948 年调平山县党中央妇委会。解放后一直在全国妇联工作。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秦城冤狱 8 年。平反后继续担任全国妇联领导工作，直至 1998 年 12 月离休。至今仍老有所为，发挥余热。



2006 年到云南省元谋县参观访问

目 录

题 词	彭珮云
序 言	顾秀莲
自 序	
简 历	
第一章 我的家庭及童年	(1)
第二章 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6)
第三章 艰苦奋斗第一课	(9)
第四章 军民鱼水情	(13)
第五章 牵着毛驴入了洞房,部队转移丢了儿子	(15)
第六章 在北平做地下工作	(18)
第七章 立志一辈子从事妇女工作	(21)
第八章 在工作岗位上锻炼成长	(24)
第九章 踏遍五大洲四大洋	(26)
第十章 “文革”动荡苦难黑暗的十年	(30)
第十一章 争分夺秒继续为党工作	(44)
第十二章 支援家乡建设	(48)
第十三章 创建北京客家海外联谊会	(50)
第十四章 弘扬客家文化,扩大海外影响	(53)
献给母亲的一束康乃馨	(57)
后 记	(59)
黄甘英在第一届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会上的讲话 ...	(61)

第一章

我的家庭及童年

我的父亲黄锡銓，字钧选，广东梅县水车圩大立乡茶山村人，生于1852年农历八月初一。

我父亲很早就从事外交工作，1880年任清政府驻日使馆文案，1882年任清政府驻美国旧金山副领事，后来调往纽约任领事，1886年又调往驻秘鲁使馆任二等参赞代办使事，1890年回国入京。1907年奉派赴日本调查农林牧事业。他在美国旧金山当副领事期间，看到美国人不把华工当人看待，非常气愤，挺身而出，为华人华侨仗义执言，并为他们办了不少好事。我父亲还与黄遵宪共同完成了《日本志》一书。

1909年，父亲与当时的清朝政界不合。他看到清政府贪污腐化，愤然辞职返乡，以己之才识造福桑梓。他在两广任职，专办外交、实业、总洋务与农工商矿两局事，以挽救衰败的清政府。他倡办仲桂公司，利用山区优势以救贫瘠，并创办绍德学校等，倡导新学，提高乡人文化，培养人才。如：著名的黄琪翔将军，过去即住在我父亲家



黄甘英之父黄锡銓(1852—1925)历任清朝美国、日本、秘鲁外交官及广东议会会长，家乡绍德学堂创办人。

里，父亲见他是个人才，即送他去保定军官学校深造。

1911年广东光复，他当选广东议会议长，兼任两广师范学校校长。1914年任税务处委员，次年升任帮办。1916年国会复开，任参议院议员，兼总统府咨议。1920年任地方行政委员会委员，仍兼任税务帮办。

民国八年时，他在参议会上质询政府出售鸦片问题，提出六大议案：要求取消辛丑赔款，提出取消辛丑赔款恢复国家关税主权的主张；呼吁政府处置德国、奥地利战败国的财产；处理中日障碍等。这六大提案洋洋数万言，和反动政府针锋相对，遭到反动势力的猖狂围攻，父亲做完这个讲演后就愤然辞职了。

1925年农历二月初七，父亲逝世于北京寓所，终年74



岁。后人念其生平辉煌，有口皆碑，将其事迹载入《嘉应州志》和《梅州文献汇编》，以教育后人。

我1920年出生，从小在北京长大。父亲去世时，我5岁，弟弟4岁。母亲带着我和弟弟遵照父亲遗愿把他的灵柩运回广东梅县老家安葬。这一路车马劳顿，父亲的灵柩走水路，母亲带着我和弟弟走旱路，先在北京坐火车到广州，再坐汽车到梅县。县城距水车镇还有60公里，母亲就雇了一个挑

黄甘英五岁时与家人合影于北京寓所：

右起：大哥黄中孚 母亲杨忆香及小弟黄同成 黄甘英 姐黄和英

夫，我和弟弟一人坐在一个箩筐里被挑着走。妈妈自己一路跟着走。当时的路面很不好走，十分辛苦。

我有两个母亲。大母亲一直留在广东老家，主要是料理家中大事务和田产。

我的母亲是小母亲，人们称她“细娘”，主要服侍在父亲身边，跟着父亲出差到北京等各地。我母亲是广西桂林人，叫杨忆香，壮族。自嫁了我父亲就是客家人了。她是典型的劳动妇女，吃苦耐劳，勤俭节约，什么事都自己动手做，像做香肠、鱼丸等，还烧得一手广东菜。为此，父亲经常请人到家中来吃饭。

在我很小的时候，特别是五岁时随母亲从北京送父亲灵柩回老家的那两年，我就观察到，我的母亲在家里毫无地位。

她什么事情都不敢管，一切听我大母亲指挥。每天她都要

到地里去干活，天天担着比我还高的尿桶在地里浇菜，吃饭的时候不能与我大母亲同桌，而是和长工一块吃饭。

当时我很乖巧，大母亲也喜欢我，只有我能陪着大母亲一同吃饭。那时看着母亲和长工一起干活、吃饭，心里很不好受，常常趁着母亲挑着粪桶下地时，蹬着小板凳把母亲洗好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晾起来，下午再收下来叠好，给大母亲送去，还常常用小话哄她高兴，希望她能对我母亲好点。



一对挚友：黄甘英与张洁珣

摄于赴抗日战争前夕



19 岁时的小八路黄甘英

我母亲因不堪挑粪桶的沉重压力，脚底板都被累成了平足，每晚我摸着母亲的双脚很是心痛。我真不想让母亲再受累，常流露出想离开这里的想法。母亲总是流着泪对我说“咱们再熬一段时间吧，等回到北京就好了”

我们在水车镇生活了两年多。七八岁时我在父亲创办的绍德学堂读了一年多书，以后又回到北京生活。在北京我家住的那个院子很大，

全由我母亲管着，那些年母亲是靠收房租养活我们。后来母亲因为过于劳累身体大不如前了，五十来岁时，得了糖尿病还长了瘤子。她知道自己活不长了，怕我们今后没钱受气，就跟一位客家老乡商量好，先借了一笔钱，等她去世后，将我家的房产卖了还上这笔钱。

我母亲人好，一生都勤俭节约，她的优良品德也感染教育了我们，使我们从小养成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好品德，从来不大手大脚的。

我母亲生下我们兄妹四人。

大哥黄中孚，清华大学毕业。他爱好体育，足球踢得倍儿棒。人家称他球王，并有：“南有李惠堂北有黄中孚”的佳话。他的外号“黄牛”。我哥哥曾代表清华大学参加足球比赛，被恼羞成怒的英国人把腿踢折了。因为清华大学队赢

了英国队，英国人生气，恨我哥哥而故意报复他。哥哥受伤后，住在清华大学足球队教练马约翰家中，马教练认我哥哥为干儿子。哥哥后来去了美国，大家推选他为清华大学在纽约同学会的总干事。因为他对清华大学非常有感情，所以清华大学每次举办校庆他都回国来庆贺。97岁时逝于美国。

我的姐姐黄和英与我感情很深，因同为女孩子小时候我与她最亲近。姐姐结婚后随着在北京海关工作的姐夫调往台湾海关，后又迁居美国。迁美不久，姐夫就去世了。姐姐是个作家，为报纸专栏撰稿，发表了不少文章，还出版了几本书。姐姐有两儿一女，她独自辛苦带大了他们，又拉扯大了他们的孩子，晚年独自住养老院，后患癌症在美国逝世。

我的弟弟黄同成小我一岁。母亲去世后，我投奔了抗日根据地，他随我嫂子去了重庆。此时清华大学搬到重庆，后改称“西南联大”。弟弟在那里也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因一直没有互通音信，我离家参加革命后一直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弟。1949年我进北京搞接收工作时，遇到原来的老领导宋任穷同志，他刚好要赴云南上任，我就托他帮我打听弟弟的下落。过了两个月，宋任穷同志来信说，真的找到你弟弟了，已经安排在某单位工作。我很高兴。可是谁想到我弟弟后来蒙受了不白之冤，被关压了好几年，最后审查清楚没有问题。因他会好几门外语，当地劳改农场执意留他在那继续工作，他也自愿留下了，在劳改农场中学当校长，妻子在农场当会计。他后来死于肝癌。留下一个女儿现在劳改农场工作。

如今，我们四兄妹只剩下我一人了。往事如过眼烟云，一切美好的、遗憾的、牵挂的都已成为回忆。

第二章

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初中的时候，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参加抗日学生救亡运动。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运动。1936年2月，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鼓舞下，我加入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民先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主要组织宣传马列主义，组织进步学生参加读书会，下乡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教唱革命抗日歌曲，唤起民众团结抗日。

1937年7月，卢沟桥“七七事变”的隆隆炮声，宣告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年纪轻、热情高，一腔热血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游行示威中，我们手挽着手，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打倒日寇，还我河山！”等口号，还一起高唱《五月的鲜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抗日救亡歌曲，以此唤醒民众，加入抗日的滚滚洪流。

记得在一次游行中，一位姓郭的学生被军警打死了，我们就抬棺示威游行。在行进的路上，军警用鞭子抽、用水龙头喷，想驱散我们。很多学生被喷倒在地，爬起来继续与他们斗争，有的向他们扔石块，有的与他们肉搏，毫不屈服，矢志要挽救民族危亡。

那时，很多学生放下书本毅然奔赴抗日前线。我因为母亲重病在身，一时离不开人照顾，当时哥哥、姐姐又都不在

北京，我既要照顾母亲，又要照顾小弟，还要管家，什么事都要我拿主意。当时我才17岁，身上挂着一大串钥匙像个小管家婆。我就一边继续读书，一边坚持抗日宣传工作。

转眼到了1938年，我母亲终于未能撑下去，50多岁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料理了母亲的丧事后，不几天，姐姐从天津、哥哥嫂子从重庆回京，要把家里的这处房子卖了，把我和弟弟接到重庆去。我不想去，要去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与张文松、张洁珣、沈亚钢几位进步同学商量，相约一同去抗日前线，偷偷做好了行前的准备。临行前我给家里留了一封信，藏在一个大家不常动的玻璃柜里，心想等他们发现时，我早已远在千里之外的抗日根据地了，到时他们只能默认我的选择。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我离家的第二天，姐姐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小外甥非要在我藏信的那个玻璃柜子里找东西吃，于是留下的信被发现了。姐姐一看信的落款日期，知道我们走得还不远，就想办法截我们回来。她把这个消息马上告诉了与我同行的张文松同学（后来成为我的终身伴侣）的家人。此时，我们已赶到了天津张文松的姐姐张洁清之处。她是地下党员，知道家里要截住我们回北京。于是告诉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把我们安置在天津一栋小白楼旅馆中隐匿起来。这一等就是小半个月，怎么办呢？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给冀南抗日根据地的组织写了一封信，告之我们在路上被阻隔了，请他们帮忙把我们写的另一封报平安的家信从那里发出，这样家里收到这封信时，知道我们已到了抗日根据地一切平安，就没办法再追我们了。此计果然成功，我们得以继续上路。一路上为不引人注目，我们化妆成家庭妇女和

老乡模样，而且只在大车店歇脚，不住旅馆。我们从天津到邯郸再往南走，一路风尘，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我們日思夜想的冀南抗日根据地，找到了抗日的队伍八路军。

当时接待我们的是冀南解放区党委宣传部长王任重和书记李箐玉同志。我们向他们表达了想去革命圣地延安的心愿，那里是全国热血青年最向往的地方。没想到他们对我们说，这里比延安的条件更艰苦、斗争更残酷，也更需要你们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说，这里才是抗日的前线，要与日本鬼子短兵相接，真刀真枪地战斗。你们不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成长吗？这就是最好的战场。他们一再挽留我们。我们想想也是，都是为了抗日，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干吧。

其实，我们也算不上知识分子，才初中毕业，张文松大点儿也就上了两年大学。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在冀南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当时我18岁，张洁珣16岁，张文松19岁。



1995年黄甘英 张文松共渡生日

第三章

艰苦奋斗第一课

正如王任重同志所说，冀南解放区的条件非常艰苦。我们首先要学会行军和“跑敌情”。队伍经常要行军，每次走个百八十里路不算事，而且经常是夜行军。遇河要趟水过去，过铁路的时候要跑步前进，有时还要挖路沟。那时八路军抗日主要靠“三八大盖”，武器既少又差，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不能硬拼，而是靠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依靠人民战争。

冀南属平原地带，解放区和敌占区边缘往往是交错着，鬼子主要驻扎在乡镇里，修筑有大碉堡，伪军在村镇也筑有碉堡，八路军为了防他们来扫荡，在驻区村口也都修筑工事，在地下挖地道，有的还与各家相连，慢慢形成了有名的地道网，对日本鬼子形成有效攻击的地道战就发生在这里。

我们这些刚入伍的新兵除了要练好脚底板子还要时时有敌情观念。那时日本鬼子常出动飞机低空飞行扫射，如遇到这种情况，只要听到敌机的轰鸣声，来得及的时候找掩体隐蔽，一般情况都是就地趴下，哪怕是水坑、泥坑也顾不得。我们把它称为“跑敌情”。小鬼子可坏了，有时追着你打，你必须拼命地跑，跑得你都喘不过气来，把棉衣、背包全丢了，轻装向前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停下来，否则就会被鬼子的子弹扫射到。我就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当时我想不能刚来就把小命给交待了，怎么也得消灭他们

几个才够本儿。当时的斗争环境非常残酷，随时都可能为革命事业献身。

说到“跑敌情”，我不得不提起与我和张洁珣生死与共结拜的干姐妹王根英同志。她比我们先到冀南抗日根据地，行军路上，我们在一起很长时间，相处得很有感情。她人很朴实，各方面都很优秀，我们从她身上汲取了坚韧不拔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力量，很快从一个城市娃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后来她被调到山西工作，不久在一次反围剿战斗中不幸遇难。为此我们难过了很长时间，非常怀念她。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她是陈庚将军的前妻，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这表明她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同志，哪怕是干姐妹都没有透露半点真实身份。张洁珣则是与我相知相交了70多年的好姐妹，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大院里，一同上学、一同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一同出走奔赴冀南抗日根据地，又一同在妇联做了一辈子妇女工作。能够这么长时间在一起应是理想、信念所为，也应算是一种缘分。

那时，我们天天行军打仗，同时还肩负着宣传群众的任务。每到驻地放下行李就要做群众工作，发动妇女为八路军做军需物品，像纳鞋、做衣服什么的。为向她们宣传革命道理还办起了识字班，教她们唱抗战歌曲，编一些快板类的段子，这样易记、好学、流传广。

当时的农村妇女大部分是文盲，为教会她们识字，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女”字，就讲解成：一个人盘腿坐在炕上，一横象征炕，交叉的笔画犹如两条腿，那个坐在炕上的人就是“女”字。又如“男”字是个合成字，解释为有力气种田的一般是男人。这样一分解，既形象又好记。每次